

DOI: 10.3979/1673-8268.20230512003

引用格式: 丁工.准确领悟习近平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系统阐释——兼论如何在“两个大局”中维护并延续战略机遇期[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1-10.

准确领悟习近平对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系统阐释

——兼论如何在“两个大局”中维护并延续战略机遇期*

丁 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07)

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如何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有借鉴又有超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深化了全党对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互动的理解和认识,把对战略机遇期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在新征程上应该怎样理解、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不仅是关系“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重大战略部署能否贯彻落实和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也是影响能否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因素。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之中既催生机遇,也充满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战略机遇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既要立足当前、更要放眼长远,充分发掘中国战略机遇期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互动交汇的客观规律,积极发挥国际形势有利于国内建设的方面,协调处理好公平和效率、资本和劳动、技术升级和保障就业的矛盾。同时,认清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既对立又统一,还可以互化的内在特点,及时更新看待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观念,坚定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信心,深刻体会战略机遇中挑战更具复杂性、全局性和可转化性新变化的要义特质,在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环境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更为有利的战略机遇。

关键词: “两个大局”;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战略机遇; 风险挑战; 对外合作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68(2024)02-0001-10

2017年12月以来,“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中国领导人概括国际形势的一种新提法。

* 收稿日期: 2023-05-12 修订日期: 2024-01-26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重点学科项目(2017DFZDQQY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中国周边外交战略”项目(2020QQYB05)

作者简介: 丁工,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和外交研究, E-mail: dinggong@cass.org.cn.

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会晤时,双方首次讨论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主题。同年9月,在北京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这一论断^[1]。自党中央提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起,国内各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两大议题: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二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意味着什么。这两个问题本质上都涉及怎样准确理解和成熟利用战略机遇期^[2]。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3]。在刚刚过去的20年里,我国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前,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已经开启之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在民族复兴与世界变局交互作用的背景下,中国前途与世界命运的关联互动愈益构成同频共振、同步共舞的格局。因此,在“两个大局”相交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交汇的重要节点,以及最为接近实现中国梦奋斗目标的全新历史阶段,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把握和用好战略机遇期,不仅是关乎“十四五”规划和到二〇三五年重大战略部署能否贯彻落实和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也是影响中国能否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因素。

一、中国战略机遇期生成环境和提出背景的变化

纵观人类历史,世界强国的崛起都与战略机遇期密切相关^[4],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把握好自己的战略机遇期,有的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做出错误的战略选择而失去发展机遇,只有少数国家发现和抓好了战略机遇期,扬“优”显“特”、因势利导,推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跃上新的台阶,从根本上转移或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轨迹和发展方向^[5]。因此,判断和抓住战略机遇期,就成为一个国家能否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因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认知和发现机遇,并且善于抓住和用好机遇。当年,邓小平同志就凭借其优异的态势感知能力,提出了国际形势进入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时期的科学论断,并据此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他指出,“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冲突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现在我们应该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抓这个时间,来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6]。一般看法认为,邓小平同志得出上述结论正是从战争与和平、世界格局与国际大势互动的角度,来审视和看待中国发展的有利机遇,已经带有对战略机遇期雏形认知的浓重痕迹和鲜明色彩。不过,此时“战略机遇期”这一新提法、新概念仍未实现纲领层面的点题破局,更没有成为进行战略谋划和综合运筹的系统性安排。直到世纪之交,新旧格局更替、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党中央才正式明确“战略机遇期”的说法。

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7]。应当说,这一判断不仅十分及时、完全正确,而且有着十分重大的战略价值和强烈的现实意义,为我国更长时期的发展起到指路定向、掌舵领航的作用。一方面,冷战格局分崩离析后,发展中国家挣脱两极格局的辖制,在推动世界格局、国际秩序演变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上升。随着发展中国家自主、自立、自强意识日益觉醒,在区域与多边机构中的发言权和领导力持续增强,一大批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和区域组织正在改变由欧美主导的战后世界秩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初见成效。另一方面,“9·11”事件以后,美国忙于反恐战争,没有精力将更多的战略关注投射到中国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面临的外部世界压力^[8]。此外,我国抓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独特机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水平实现了“从零追赶”到“部分领跑”的跨越,也为争取和谋求战略机遇期储备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由此可见,战略机遇期既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又有主观判断认知的成分,故而是观念意识和物质力量结合的特定产物^[9]。

然而,自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这种有利于战略机遇期生成的情况却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有利因素的中长期趋势与不利因素的阶段性特征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一方面,随着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整体实力增强、战略地位提升,发展模式转向更多依靠扩大消费和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等,各种有利因素、有利条件正在逐步集聚,将为自力更生、自主发展创造新的物质条件和内在优势,使得我们维护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资源手段不断增多、水平能力不断增强。但另一方面,从国际看,随着美国外交任务完成由应对大国崛起“跃升首位”和“反恐防扩”退居次席的先后次序调整,大国竞争重新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对华战略遏制升级、对俄战略挤压加大,导致我国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升高;而从国内看,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压力过重、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革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又给我国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谋取战略机遇期增加了难度^[10]。因而,在战略机遇期即将迎来 20 年时间节点的前后,质疑我国是否还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之中的“看空”舆论便不绝于耳。

尽管在最近一段时期,国际战略形势和周边安全挑战似乎呈现集中和大量爆发的“井喷式”状况,使得中国对外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和沉重压力,但综合来看,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对内改革发展、对外交流合作工作,我国依然具备很多有利的内外部因素和主客观条件^[11]。首先,此轮国际体系转型的基本特点是“非战争”形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主流,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前进,全球热点还不足以引发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既有国际运行机制愈加公正合理能够继续为我国集中精力搞发展提供总体良好的国际交往秩序和外部发展环境。其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结合客观现实、时代条件和形势要求的基础上,探索出一系列具有本国特色、实现民族复兴崇高追求与促进世界发展神圣使命相结合相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模式,建立起一整套思想深邃、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和理论体系^[12]。我国确立、实践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文化和理论体系,拥有巨大的抗冲击韧性、发展潜力和回旋余地,既能直接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也为适应国际更高标准的规则奠定坚实基础^[13]。最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合作性远大于竞争性,两国仍然处于较高强度的相互依存状态之中。美国一些政客虽然在多个领域全方位打压和围堵我国,百般阻挠中美各领域的交往,竭力破坏中美合作大局,致使中美摩擦不断,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但从根本上讲,中美关系早已不是冷战时期非黑即白、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更不是冷战期间美苏的极致对抗模式,而是非敌非友的利益共同体和竞争对手、合作伙伴复合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中美两国在避免将分歧争端上升为对抗冲突方面存在一致利益和共同需求。因此,中美关系走势会成为影响战略机遇期存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整体战略环境,中美双方既合作又斗争的总体格局也不会破坏战略机遇期存续的基本面。正是基于上述客观分析和综合考虑,党中央综观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和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再次得出中国战略机遇期并未终结,只是内涵条件发生变化、风险挑战因素上升的重大决断和科学结论^[14]。

二、“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新态势赋予战略机遇期新意涵

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5]。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辩证看待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的变化,增强忧患意识,继续抓住并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定信心,把握主动,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16]。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高度交叠重合并非机缘巧合,而是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以来,中华民族尽管饱受磨难,但仍一以贯之地坚持进行艰辛探索和接续奋斗,到如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结果^[17]。可以说,在我

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的关键时期,学懂、弄通、悟透“两个大局”的重要论述和内涵深意,既是我们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的先决条件,也是运用和放大战略机遇期效应的立足根基和坚实保障,已经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艰巨任务。

第一,“两个大局”与战略机遇构成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循环联动关系。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任何现象都会引起其他现象的产生,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联系^[18]。因果联系作为客观事物普遍具有的一种逻辑关系,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和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之中。当今世界,随着各国之间利益交融的空前紧密,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也更频繁、更密切。事实上,在“两个大局”的历史交汇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有着多方面、高密度、深层次的联动关系,从而与战略机遇构成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交替循环的因果联系。

首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形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曾具有辉煌文明与领先国际地位,自公元更始到19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始终占据世界经济的20%以上。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同朝代虽有强盛衰弱之别、统一分裂之变,但直至欧洲国家开始殖民扩张之前,中国在亚洲国际秩序中始终处于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19]。近代以后,中国国力衰微、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滑落,逐渐失去了大国荣耀。自那时起,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便是中国各族人民追求的基本目标和最高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具备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踏上新征程、进入快车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族复兴大业的引领和感召下,我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充分把握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资源、要素实现世界范围配置带来的红利,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布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了从跟随到同步、再到与世界一流齐头并进,乃至局部领先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并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换句话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国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外在表现就是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的关键参数和基础要素。

其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战略机遇。从历史上看,近代国际权力的转移都是在西方国家内部进行的,从最先崛起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再到后来陆续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国家之间轮转和更替。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国际体系变革不再是西方大国的专利,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和地区组织在体系变革中积极发挥独特作用。自冷战结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壮大引发国际格局新一轮的变革和调整,国际权力斗争形势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世界秩序日益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成为改变世界战略格局,推动百年变局生成的主体因素和重要力量之一。我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天然伙伴和战略依托,国际秩序朝着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演变,自然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进而又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更好的外部条件和战略机遇^[20]。可以看出,战略机遇的生成是我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良性互动的结果,已经从相对稳定型和自发型为主向相对脆弱型、更加依赖主动塑造能力的方向转变。一方面,作为自变量的民族复兴同成为因变量的“百年大变局”形成因果逻辑关系;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以自变量的形态与作为因变量的战略机遇形成因果关系,而其衍生的战略机遇又以自变量的形态与作为因变量的民族复兴形成因果逻辑。因此,“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新态势,使之前国内发展与战略机遇、国际环境与战略机遇两组并行的共生关系,变成互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循环因果联系。

第二,“两个大局”中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的内在特点和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改变,世界变局增强了

运筹战略机遇的敏感性,民族复兴降低了应对风险挑战的脆弱性。在原本的定义中,相互依存的敏感性是指一国战略变化或国际事件导致另一国对变化做出反应的速度,影响产生作用的效果越快,说明该国对外部环境变化敏感性越强,反之越弱;而脆弱性则是指相互依存双方为抵御变化而采取的替代性选择所需付出的相对成本,付出代价越高说明脆弱性越大,反之越小。不难看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时代背景和外部环境,“两个大局”相互交织激荡促使战略机遇内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发生变化^[21]。

首先,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中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的边界界限趋向模糊,“危”和“机”日益形成共生并存之势,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既带来重大机遇,也提出了严峻挑战,从而促使中国在战略机遇期框架内感知条件变化的反应程度日益提升。尽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必然趋势、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使然,但同时也将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近年来,世界力量平衡和国际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危机感上升,双方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博弈呈现胶着僵持局面,全球治理格局日益显露出多元主体、复合依存、多重制衡的过渡形态和结构状态。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首先做到利用“外压、倒逼”机遇处理好内部问题,做好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通过标准升级增强自身竞争力和抵抗力,借此促成“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内功修炼,从而真正把风险挑战变成“以压力促动力”的历史机遇。同时,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对于我们党能否长期、牢固地执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崛起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作用,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引导并推动国际秩序和世界变局朝着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有利于保障更多国家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发展,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营造更为有利的世界秩序和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22]。

其次,民族复兴是支撑战略机遇存续的关键参数和基础要素,也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框架内承受外部强加因素影响的能力日益升高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由低端向中端甚至高端进军,并且整体层面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协同共进的发展新格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我国已经具备了雄厚物质基础、丰富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和强大科技实力。特别是我国整体科技实力显著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方向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成果,如量子密钥分发、铁基超导、中微子研究、干细胞研究、克隆猴、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卫星等,有的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处于并行阶段,有的甚至开始领跑,化学、材料、工程科学等学科整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23]。这些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推进下取得的建设成就,无疑是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和抵御外部风险的基础支撑,也是护持战略机遇期的前提保障和根本依托。事实上,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维护好自身的核心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当前,战略机遇期的生成方式已实现了从被动顺应到主动引领的机理转换,战略机遇期的维护和延长更多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经营和谋划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在世界大变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交汇之中,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就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机遇;中国自我能力的持续提升,就是加持和助益民族复兴的战略机遇。“世界大变局”中最为显著和深刻的变局,就是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就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因此,未来我国应该继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引领下,充分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酝酿、蓄势待发的机会窗口,加快国内相关政策与产

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努力抢占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最前沿和制高点,积极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进而为我国延续和运筹战略机遇期积蓄更加厚实的物质基础。今后,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快速上升,我国发展本身在影响全球局势方面的实力和分量必将越来越大,我国保障战略机遇期的手段和资源也会越来越多,这将进一步降低战略机遇中的脆弱性因素^[24]。

概言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身处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之中,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作出的重大政治和战略判断,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和对现实发展实际的深刻总结。未来我国要在运筹战略机遇期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统筹“两个大局”中有意识地放大和创造战略机遇,这既是根据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客观环境、现实条件变化提出来的系统概念和正确定位,也是重塑我国对外合作和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只有以这一重大结论为指导,才能正确认识时代性质,看清整体发展态势,科学判定世界方位,从而制定出正确的对内对外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也只有从“两个大局”的站位高度出发,预先谋划、超前布局,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和积累更多有利条件,进而充分抓住和全面用好机遇与挑战都有新发展变化背景下的战略机遇期,实现从寻找发展机会向制造发展机会的进阶升迁^[25]。

三、在“两个大局”中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思路与举措

当前,我国正面临着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内部挑战有增无减的局面,从根本上讲,正是“两个大局”交汇重叠的产物,也是“两个大局”相互碰撞、彼此作用的结果。综合来看,虽然我国发展面临着各种内部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外部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但同时,国家发展的基础支撑和战略依托不断夯实,内化改革、外化开放产生的政策效应持续放大,国际社会成员倾向于寻求多元参与和平等协商的方式,以争取最大程度的多边合作等,内外各种积极有利因素加速集聚,也给我继续保持发展态势创造了诸多优势和条件。可见,民族复兴全局与世界百年变局的融合交汇进程既带来了严峻风险挑战期,也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期^[26]。如果说,过去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来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那么未来把握和运用战略机遇期的客观规律,主动谋取和营造积极外部环境与国际条件,就成为学懂、弄通和悟透战略机遇期本质特点的重要遵循,而这也促使了战略机遇期的性质从客观形成向主动塑造的重大转变^[27]。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战略机遇期的时间范围作了明确规定,但战略机遇期中的“二十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时间限定,不能教条式、程序化地理解这个长度意涵和时间论断。也就是说,“战略机遇期”本质上是一个交替循环的历史概念,是一个广义、宽泛和“可伸缩”的时段界限,会跟随客观条件、内外环境以及主观能动等因素而变化。更确切地讲,由于战略机遇期内生机能中的“随顺”元素减少、“筹谋”成分增多,中国需要通过更好地发掘战略机遇期中的各类正向和多重利好因素,同时尽量减轻和规避不利方面的损害来维系甚至延续战略机遇期。事实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议、“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一系列文件在论述战略机遇期的生成和演化时,都使用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时间状语,以此说明“战略机遇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将长期存在,不过前提是需要主动作为、科学应对风险挑战。因此,在“两个大局”相互作用的新形势下,我国要想更好地维系、使用和延续战略机遇期,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稳定与发展、变量与常量、危机与契机三对重要关系。

第一,在世界变局中抓住战略机遇推进民族复兴全局,要协调好发展和安全的有机统一关系^[2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对协调好发展和安全问题高度重视,并根据新时期发展和安全内涵与形式交错变化的新特点,从发展和安全高位贯通、有机融合、互动交织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形成新发展理

念与大安全观念双向互济的格局^[2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还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深刻认识“十四五”时期各种动荡源、风险点不断增多和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基础上,单列专章就此作出了系统表述、统筹规划和战略部署。如果说“两个大局”是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空坐标,那么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兼顾的“两个格局”则是新时代中国推进各项工作的依托和支撑。

一方面,发展是实现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为总体框架和战略布局的第一要务,安全是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和政权永固的头等大事。作为关乎国家兴衰存亡的两大支撑,发展和安全既各有内涵、独立运行,又密切相关、彼此依托,正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构成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基底柱石。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相互依存,在更广范围内彼此渗透、相互影响,我国的发展既取决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在“全局”和“变局”深度演进的复杂条件下,我国不仅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发展进度、性质、朝向的重要动能和主要力量,也承受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外部势能的反作用力。这就意味着,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内在联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冲击挑战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与国际体系实现良性互动、共同进步的需要。事实上,在我国与国际体系的既有互动中,我国越是加快发展、主动给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就越能够对国际体系产生正向影响、带来安全保障,也越有可能化解结构矛盾和外部风险,从而实现自我安全和世界共同发展、自我发展和世界集体安全的交融共生。

第二,在世界变局中抓住战略机遇推进民族复兴全局,要把握好变量和常量的内在联系。作为全球化中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个侧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互为能够转化的常量和变量。首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源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变带来的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格局,以及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的深刻调整变化,是世界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力量等相互作用和综合演化的结果^[30]。其中,最为基础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最为核心的变量则是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互动过程和演进趋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是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开创出来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变量之一,不仅反映出当今世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集群式崛起的时代趋势和历史潮流,更突出体现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原有的世界权力分配和力量对比格局的客观现实。虽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宏观环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则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下形成和展开的,但更关键的是,中国本身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变量——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中国大幅扩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是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形成中国与世界的大发展、大趋势、大变局^[31]。

其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日益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逆转的恒定常量。但毫无疑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对我国的发展环境产生传导和倒灌效应,仍然是促成或者制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此而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也是一种可以塑造的未来,在特定情况下又可以转换为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变量。特别是要看到,国际力量兴衰消长是推动全球和地区形势发展、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大国更迭和实力对比的消长沉浮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由于中美是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在一系列全球重大问题的治理上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加上两国经济力量对比正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动之中,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格局的走向。

然而,随着中美两国实力日益接近,其他西方大国也无力出头,我国相对其他大国的实力对比发生根

本性变化,这引起了美国对华的失落感和焦虑感。美国战略重点已经转向遏制新兴大国崛起,并明确将我国锁定为威胁自己霸权的头号挑战者。现在,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领域继续保持绝对领先地位,中美双方对位关系仍处于“美强中弱,美攻中守”的态势。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要面对美国在国际体系中明显的实力优势,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也将面对更大的外部安全压力和更为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因此,从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角度看,我国需要积极运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空间,充分挖掘和善用其有利于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积极一面,力争把这个变量转换成有益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常量。

第三,在世界变局中抓住战略机遇推进民族复兴全局,要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关系^[32]。现今,各国利益和命运紧密相连、深度交融,中国与世界关系随之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的进步和繁荣,中国与世界共同处于关键发展阶段,一起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前所未有,挑战空前严峻;机遇更具有战略性、可塑性,挑战更具有复杂性、全局性^[33]。这就是说,全面统筹中国战略机遇期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叠重合的特殊态势,构成了存亡相依、安危相伴的对立统一体,也构成了机遇和挑战同体共存的有机集合体。因此,我们只有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将民族复兴与世界大变局紧密结合,科学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辩证关系,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善于在大变局中整合实力、明确方向、找准定位,善于在大变局中捕捉机遇、创造机遇、经营机遇,才能更好地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

同理类推,面对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这样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局势,我们只要充分调动和用好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一切积极因素和正面预期,全面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框架,防范各类风险出现连锁反应和产生联动效应,就依然能够从当前的世界大变局中创造出新的机遇。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特别强调“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34]根据历史经验,崛起大国伴随实力的不断上升,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也会日益增大,这就意味着未来我们还会遇到更多更大的风险。面对内外矛盾叠加和“明滩暗礁”遍布的复杂局面,要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和挑战,就要从国际体系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出发,精确把握和系统驾驭机遇与挑战的辩证关系,既不宜妄自尊大因过度亢奋、乐观估计而冒进,也不应妄自菲薄因过度悲观、折冲下沉而退缩;既要有防范危机和风险的先手预案,超前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力争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后发高招,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应对措施,防止不利事态进一步恶化。

四、结 语

不难看出,“战略机遇期”的生成从来都是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偶然与必然等多种因素相互激荡、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涵与条件都会随着多方积极因素的变动而拓宽和延展。因此,观察和辨识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应当打开思路、拓宽视野,应当放到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历史中去思考,需要以把握全球热点事态进程的主题基调为视角,来分析战略机遇期的内涵背景和面临的风险挑战,需要以把控地区战略形势发展的主旨脉络为基准,来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而不只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形势变化来判断。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盛而衰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没有把握住当时全球大变局的脉动,从而错失发展机遇,远远掉在时代后面。如今,中华民族早已把握住时代的律动和脉搏,迈向复兴的进程紧紧与当今时代同行,与世界大变局紧密联动^[35]。未来我们要在统筹“两个大局”中充分利用好这段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加快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引导国内资源和国

际资源更好对接,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彼此融注的新发展格局,从而助力“两个大局”实现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的目标,为维护和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创造更为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36]。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1:96.
- [2] 方长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战略期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20(12):57-66.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
- [4] 宫力.战略机遇期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J].理论视野,2013(5):59-63.
- [5] 黄仁伟.论战略机遇期[J].世界经济研究,2003(6):5-11.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33.
- [7]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2.
- [8] 徐坚.重新认识战略机遇期[J].国际问题研究,2014(2):53-67.
- [9] 刘元春.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N].人民日报,2019-05-22.
- [10]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4):4-7.
- [11] 高祖贵.把握新变化,更好维护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N].光明日报,2019-09-11.
- [12] 李滨,陈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家利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7):4-18.
- [13] 张艳,杨龙奉.中国共产党历史自信生成的三重逻辑[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22-31.
- [14] 袁鹏.中国战略机遇期并未终结[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7-30.
-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28.
- [16]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22.
- [17] 朱锋.“百年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5):83-87.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3.
- [19] 蔡佳禾.2050年的中国、东亚与世界——基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分析[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7):25-34.
- [20] 丁工.胸怀“两个大局”,用好“战略机遇”[J].中国发展观察,2022(3):70-73.
- [21] 李凡.从两个大局出发思考处理问题[N].学习时报,2020-05-08.
- [22] 杨洁勉.辩证把握国际格局[N].人民日报,2019-07-09.
- [23] 白春礼.从新中国70年看科技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9-07-10.
- [24] 杨新铭.深刻理解两个大局的内在联系[N].经济参考报,2021-04-20.
- [25] 丁工.在“两个大局”中运筹战略机遇和应对风险挑战——学习领会习近平相关论述的理论逻辑、践行方向和价值意涵[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9-26.
- [26] 颜晓峰.统筹“两个大局”应对风险挑战 弘扬担当精神[J].求知,2014(2):53-67.
- [27] 丁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存续[J].国际经济评论,2017(6):9-22.
- [28] 韩文秀.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N].人民日报,2020-12-09.
- [29]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1-32.
- [30] 陈理.胸怀两个大局是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J].机关党建研究,2020(9):29-32.
- [31] 胡鞍钢.中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本走向与未来趋势[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7-22.
- [32] 邹德文.辩证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危”与“机”[N].湖北日报,2020-11-05.
- [3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821.
- [34] 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4-11-29)[2023-03-0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723.htm.

[35] 何毅亭.民族复兴与百年变局[N].学习时报,2021-04-14.

[36] 于军.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J].行政管理改革,2016(1):6-7.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 risks and challenges:
On how to maintain and continue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period
in the "Two Overall Situations"**

DING Gong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Beijing 100007 ,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how to grasp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face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se statements draw both from past experiences and push beyond them , combining inheritance with development. They deepen the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 risks and challenges , elevat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to a higher level. How to understand , grasp and utiliz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the new journey is not only a prerequisite for whether the major strategic deployment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long-term objectives for 2035 can be implemented smoothly , but also a key factor affects whether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an be achieved.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 and the changes are full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is requires us to deeply understand and accurately grasp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tatements on seizing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while also taking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t requires fully exploring the objective laws of the intersection of China's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rend changes during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 actively leverag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conducive to domestic development , and coordinating the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s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 capital and labor , and technological upgrades and employment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 we must recognize that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are both opposed and unified , and their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can also transform. We need to timely update our concepts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 firmly believe that opportunities outweigh challenges overall , deep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challenges being more complex , comprehensive , and transformable within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and risk challenges coexist , we must create more favorabl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wo Overall Situations"; "Two Centenary Goals"; strategic opportunity; risk and challenge; external cooperation

(编辑: 蔡秀娟)